



复旦卓越·经济学系列

(第二版)

教育经济学

林荣日 编 著



复旦卓越·经济学系列

(第二版)

教育经济学

林荣日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经济学(第二版)/林荣日编著. — 2版.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
(复旦卓越·经济学系列)
ISBN 978-7-309-06158-1

I. 教… II. 林… III. 教育经济学 IV. G4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3419号

教育经济学(第二版)

林荣日 编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鲍雯妍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大丰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960 1/46

印张 21

字数 376千

版次 2008年7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6158-1/G·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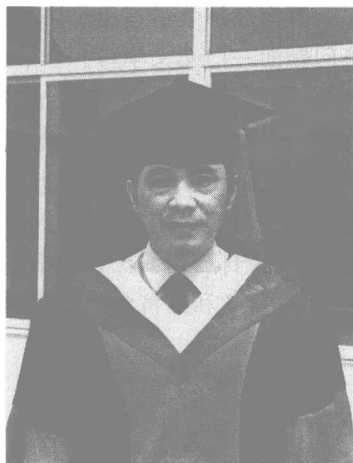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林荣日(1963—),男,福建省平和县人,现在复旦大学高教所工作,教授,工学学士、工学硕士、法学博士,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教育财政和教育政策等。2004 年获得加拿大联邦政府资助,于 2004 年底至 2006 年初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做项目研究。开设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软件等课程。出版著译作 5 部,即《教育经济学引论》(合译)、《教育经济学》(教材)、《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以转型期中国高等



教育制度为研究重点》(专著)、《加拿大高等教育:不同体系与不同视角》(译著)、《新型产业工人与中国工会——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研究》(合著)。发表教育类论文、译文 150 余篇。主持课题 19 项,其中省部级 1 项、市级 6 项、横向 3 项、其他 9 项。目前在研主要课题为“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与教育支付能力实证研究”(2007 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另有两项为上海市教委资助项目。科研成果获奖 3 项,其中上海市课题研究成果一等奖 1 项,其他 2 项。

内 容 提 要

教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领域部分经济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全书共分 11 章,分别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基础、广义和狭义教育成本、教育投资、教育收益、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内部回收率、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层次论等。本书力图从概念出发,逐步深入地探讨相关学术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些较有争议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既可作为教育学科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社会学、人口学 and 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学者和学生的参考用书。

再 版 说 明

2001年6月,拙作《教育经济学》(第一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它有幸被国内部分院校作为本科生专用教材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经济学”科目的指定参考用书。多年来,因书结缘,笔者结识了许多国内学者和学生,有些人已成为我的真挚友人,这是当时编写此书时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也算是意外收获。由于该书第一版印量不算太多(6 000本),2004年之后,书市上已很难再买得到它,因此,在近几年,常有外地学生直接打电话或写信给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购买到这本书,或希望我能再版此书。

近些年来,随着研究和思考的深入,笔者逐渐意识到原书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对教育投资性质的分析有误、个别数学公式出现偏差、一些观点的表述不正确、对教育成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等。本书第二版力图弥补这些缺陷。

与原书相比,本书第二版改动最大的是有关教育成本部分。为了帮助高校财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估算学生培养成本,笔者有意增加了“狭义教育成本”这一章。其实,这一章内容是笔者于2007年暑假期间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给国内部分高校财务处处长培训“教育成本实务”时的部分讲义稿,此外,这一章还探讨了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的几个问题。在“广义教育成本”这一章,增加了笔者最近提出的估算研究生培养成本的新方法。本书第二章增加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要点述评”一节,因为有读者来信说,原书对教育经济学赖以支撑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描述太少或分析不够深入。对教育投资的性质问题,笔者在原书中的分析显然是不大正确的,现在有必要加以修正。在原书“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内部回收率”一章中,笔者在计算一些数据的贴现值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本书再版

时,理当纠正这些错误,以免再次误导读者。

在本书新版即将问世之时,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一些朋友和老师表示感谢,他们是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熊庆年教授、邬雪帆老师、田凌晖博士、丁妍博士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徐惠平老师、鲍雯妍老师、曹珍芬老师和孙晶老师等,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鼓励和支持,我才下定决心修改和再版此书。也感谢那些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或写过信的国内读者,他们的意见,对我修正原书的部分内容起着很大作用。最后,感谢我的妻子陈蕾女士和儿子林虞之对我的一贯支持和关心。

林荣日

2008年4月18日

序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和手段,来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一些经济问题。这门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英、美等国,70 年代末才传入我国。30 年来,我国教育经济学者运用国外学者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结合国内实际,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有关问题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理论和观点。目前,我国比较著名的教育经济学者,如王善迈、王玉昆、厉以宁、陈良焜、赖德胜、蒲心文等,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其功不可没。但是,由于这门学科比较年轻,许多理论和观点尚未成熟,加之不同学者的出发点不同、侧重点有异,迄今,在这一学科领域还未能形成比较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在所难免。同时,也正因如此,对我国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才大有可为,学者们若能借助有关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要取得较大突破,应该说,还是很有可能的。

多年来,笔者在从事复旦大学“教育经济学”研究生专业课程的教学和教育经济问题研究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不少国内外研究资料,对我国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感兴趣,已经做过和正在做的相关课题近 10 项,应该说,自己已收集到许多实证数据和信息。近几年来,笔者对教育成本问题、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等,尤其感兴趣,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或许是毕业于工科院校的缘故,我一直习惯于从概念出发,逐渐演绎、探究相关问题。随着思考的深入,我认为我国有些学者对教育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误解,如把“教育内部回收贴现率”当成“教育收益率”,并把计算“教育内部回收贴现率”的方法,粗率地认为是计算“教育收益率”的精确法等,这是不对的。再者,我国

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有关“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法,实有值得商榷处。此外,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对教育的负面影响等问题,不够重视,似乎一讲到教育,一切都是好的、十分完美的,只有好的收益,没有坏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

拙作就是在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的基础上写就的,当然,也正因上述种种原因,加之笔者水平有限,在认识上和某些观点的表述上,也肯定会有错误,在此诚请诸位前辈、学者同仁以及读者批评指正。

笔者自以为,与其他“教育经济学”著作或教材相比,拙作主要在以下若干方面有所不同:一是为便于高校财务部门估算本校学生培养成本,把教育成本区分为广义教育成本和狭义教育成本两种;二是提出了测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新方法——“人力资本—教育收益率测算法”;三是对教育收益的内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四是对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内部回收贴现率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和重新界定;五是对教育的负面影响和经济增长的负作用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在编改本书第二版之前,笔者原计划再增加三章,即“学校的经营与管理”、“高校的规划、预算与决策”和“教育产出”等,因为这些内容是我近几年在国内和国外时都思考得比较多的议题,也做过一些实际研究,而且我也认为研究这些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因时间比较紧(被要求在今年 7 月份之前再版)和篇幅有限,只好暂且把它们搁置起来。笔者计划在接下来的一本专著中再初步探讨这些问题。

林荣日

2008 年 4 月 18 日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教育经济学的概念.....	1
第二节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	10
第三节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6
第四节 教育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8
第二章 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1
第一节 经济学理论基础	21
第二节 教育学理论基础	32
第三节 人力资本理论	39
第三章 广义教育成本	47
第一节 教育成本的概念及教育成本的类别	47
第二节 广义教育成本的计量对象与内容	52
第三节 教育直接成本的计量方法	54
第四节 教育间接成本的计量方法	65
第五节 我国研究生教育成本内涵与估算方法新探	78
第四章 狭义教育成本	87
第一节 狭义教育成本的概念	87
第二节 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对象与核算期	88
第三节 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原则	89
第四节 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程序与核算内容	90
第五节 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方法	93
第六节 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和潜在租金总值的估算方法	94
第七节 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的若干问题	94

第五章 教育投资	104
第一节 教育投资的概念与性质	109
第二节 我国教育投资的类别	116
第三节 影响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的因素	120
第四节 确定教育投资总量及其比例的方法	131
第六章 教育收益	144
第一节 教育收益的概念	144
第二节 研究教育收益的意义	146
第三节 教育直接收益	149
第四节 教育间接收益	161
第五节 教育的负面影响	171
第七章 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内部回收率	175
第一节 辨误	175
第二节 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内部回收率的概念	176
第三节 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内部回收率的计量方法	180
第四节 教育内部回收率的作用	188
第八章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础部分	193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193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负作用	197
第三节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198
第九章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定量部分	203
第一节 基本思路	203
第二节 舒尔茨余量法	206
第三节 丹尼森系数法	213
第四节 部分国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19
第五节 丹尼森系数法忽略的因素	222
第六节 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	225

第十章 教育产业化	269
第一节 教育产业化的概念.....	270
第二节 三种观点.....	271
第三节 争论的焦点.....	275
第四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	278
第五节 教育产业化的途径.....	279
第六节 小结.....	283
 第十一章 教育层次论——教育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新视野	284
第一节 教育层次论的概念、假设、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284
第二节 数学模型的建立与可靠性检验.....	293
第三节 “标的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306
第四节 教育层次的协调性问题研究.....	315
 主要参考文献	322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教育经济学的概念

一、教育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说到教育的经济功能或经济意义这一话题,并不是近期的事。早在我国春秋战国初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管仲就曾说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①就是说,一年之中的计划,最重要和最合算的还是“树谷”;十年计划最合算的就是“树木”,而百年大计,没有比培育人更重要和更合算的了。如果说,种谷可获一倍的利润的话,种树可获十倍,而育人却可获百倍之利。事实上,这可以说是简朴的教育经济学思想。

在西方国家,至少在18世纪中晚期,就有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包含在固定资本的定义之中。他们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产技能,从而促进经济生产活动,因而人力资本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对此,最为著名的当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他的许多观点仍被视为“教条式”的经典思想,而无人能予撼动。毫无疑问,他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具有相对的超前性和先进性,即使从现在的视角看,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大师。他在著名的《国富论》或《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曾非常深刻地论述了人力投资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生产的促进作用。尽管他没有直接对人力资本的价值进行估算,但他始终确信,人力资本投资会以较高的终生收入形式,获得巨大的利润。

对教育的经济意义作过深刻论述的早期西方学者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亨利奇·图伦(Heinrich von Thunen)、卡尔·马克思、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奇·

^① 引自《权修》。

李斯特(Frederich List)等人。卡尔·马克思也曾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他说:“劳动力的教育费……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①,“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②。

尽管在18世纪和19世纪,有那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教育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和个人终生收入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科学而系统地分析教育对社会经济的贡献问题,即使是定性分析,也是相当不全面的。因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将这一时期称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幼稚期”^③。在这一时期,即使用数学方法分析个人的教育收益方面的尝试,也相当少见。其原因主要是很难获得许多相关的数据,如,按个人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和职业等分类的确切数据,极难得到。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爱尔查南·科恩(Elchanan Cohn, 1979)指出:“只要在获得按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分类的个人收入数据方面受到限制,就不可能对教育的货币收益进行有效的研究”^④。

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当属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如1904年詹姆斯·道奇(James Dodge)“将几个大工厂从业人员的收入,按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受过学徒训练者、职业学校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等几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货币价值”^⑤。1924年,前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1877—1974)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论文中,也作过这方面的研究和尝试。

但是,这些学者的尝试性研究,还是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和怀疑,因此并没有产生教育经济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其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落后所致,尤其是数理统计技术的落后,使得要进行大量数据运算是不可能的。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这方面的研究才产生突破性进展。不过在此之前,有关教育的经济功效和经济意义的研究,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它为后来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因此,早期经济学家的贡献,不应被抹杀。

可以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许多经济学家才真正开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感兴趣,他们先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入手,分析个人从教育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25页。

③ Martin Carroy,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PP339—359.

④ [美] 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蒲心文著,《教育经济学初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获得的直接收益问题,进而通过某种特定的假设条件,设计出一些似乎行之有效的数学模型,最后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值。因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用工作的人一小时和资本值来衡量),只能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无法加以说明和解释。这一无法解释的部分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残值”或“残差”。

1957 年 8 月,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在美国《经济统计论评》上发表文章认为,这一“残值”首先是由技术的贡献所致,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后来,爱德华·F·丹尼森(Edward F. Denison, 1962)、兹菲·格利力兹(Zvi Griliches, 1966)和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1959)等经济学家,又把这一“技术的贡献因素”,进一步分解为资本的质量和人力投资两方面因素。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舒尔茨的一系列研究逐渐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观点,即教育的费用并不应该被看成为“消费”,而更应该被视为“投资”,这种投资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它是能够提高劳动者生产物质产品的一种智力投资。因此,舒尔茨认为,正规学校教育至少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它可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产值,因而这一教育投入,也是经济意义上的投资行为。

尽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科波·明瑟(Jacob Mincer)在 1957 年发表的《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尔什发表《人力的资本观》和《工作培训:成本、回报及某些含义》^①等文章、著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真正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还是舒尔茨完成的。他在 1957—1966 年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这方面文章和著作,全面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并进行了教育经济效益分析,尽管其结果在现在看来,是相当不可信的,但是其开拓性意义以及随后几十年对欧美诸国,乃至全世界在类似领域的研究的指导性意义,是完全不应被抹杀的。舒尔茨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真正应该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不是杰科波·明瑟,也不是沃尔什,而应该是舒尔茨。舒尔茨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March, 1961);“教育与经济增长”(“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cial Forces Influencing American Education*, Edited by N. B. Herry, Chicago, 1961);“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Investment in Man: An Economist's

^① Jacob Mincer, “On-the-Job Training: Costs, Returns and Some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Suppl. (Oct., 1962), PP50-79.

View", *Social Service Review* 33, June, 1959); 以及《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等。这些文章和著作,奠定了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教育经济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舒尔茨首次计算出了美国1929—1957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这一著名数据。

但是,在50年代之前,教育与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许多经济和教育的研究学者,均是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大量的研究,而没有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进行编撰和整合。但大量成果的出现,在60年代初,显然已具备这一方面的条件。因此,1961年,约翰·韦锥(John Vaizey)出版《教育经济学》一书(*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1),这时才可说真正诞生了“教育经济学”这一独立的学科。

“教育经济学”自诞生至今,差不多已达50年,它是教育与经济这两大学科领域成功结合的典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60年代末,美国部分院校已设置“教育经济学”这一专业,到70年代中期,欧、美诸国许多大学增设了这一学科、专业。据说,六七十年代,这一学科是当时欧美大学经济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近50年来,“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有很大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的研究,归纳起来,这一学科至少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乐观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称之为“第一代”(First Generation),其时间跨度大约为整个60年代。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把这一阶段称为全盛阶段(Heyday)^①。在这一阶段里,涌现出一大批教育经济学家,其中以西奥多·W·舒尔茨和爱德华·F·丹尼森为代表,“他们的文章、著作传到欧洲和远东地区,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从1961年到1966年形成了对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及教育经济意义的数量化研究的热潮,推动了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②

其实,这一阶段也是教育经济学的起步阶段,尽管许多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众多领域有所涉及,但是,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数学模型,还是比较幼稚的,没有形成令人较为信服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其前提假设过于死板和笼统;获得数据、信息的手段和途径不够科学,也极欠精确。但说它是

^① Martin Carnoy,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PP339 ~ 359.

^② 蒲心文著,《教育经济学初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全盛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大批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对这一新生学科注入了极大的热情,花费了许多精力,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并对教育经济学的新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其精神还是相当可嘉的。根据蒲心文的统计,1961—1966年这短短的6年时间里,共出版了约800部著作,而文章数量更是不计其数^①。

因此说,这一阶段为教育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日后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提供了许多实践案例,为后来教育经济学者指明了一些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怀疑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称之为“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这一阶段大约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经过60年代的全盛时期,尽管许多学者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但由于上述存在的种种不足,使有些学者的研究走入了死胡同,如盲目推崇一些理论和数学模型,死板地对某些国家的教育经济功效进行估算,而没有顾及各国在制度、体制、观念、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使其结论常常难以令人信服。有时对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即使用同一种测算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恰好相反或出入极大。这一切,无疑给挑剔的传统理论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提供了反击的借口。

例如,根据美国学者汉森(Hansen)、丹尼森(Denison)、哈诺奇(Hanoch)和英国学者布劳格(Blaug)、墨西哥学者卡诺伊(Carnoy)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与物质投资相比,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丹尼森通过自定义模型,算出了美国在1909—1929年,个人通过教育而就业的收入增长率为23%,1929—1957年这一数据达到42%,而在这两个时段内,每个工人增加资本投资的贡献率仅分别为29%和9%。可见,后一组数据远低于前一组,说明从个人角度讲,教育的投资极为合算。而奈拉·A·M·贡丹(Nalla A. M. Gounden)对印度的研究结果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物质投资在印度要比教育投资合算得多^②。

另外,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在教育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1945年到60年代末,入学人数的迅速扩大是整个世界教育体制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却已发生了变化。以前,学者们对教育

① 蒲心文著,《教育经济学初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Nalla A. M. Gounda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n Indi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 (Summer, 1967), PP347-358.